超逸風雲

已饑已溺

「憨山大師年譜」讀後

劉兆祐

憨山大師是明代的高僧，對佛學固不必說，即對儒、道思想也有極深的研究。

這本年譜是由大師自敘，東海那羅延宿侍者福善所記錄的。福善隨侍大師數十年，由他來記錄大師一生的言行，自然是讀來親切動人。其文筆優美，措詞謹嚴，一方面像讀一本好的史書那樣條理畢具，一方面又像是欣賞一篇文辭優美的散文，那樣生動感人；然而最可貴的，還是契刻出憨山大師的思想。大師的思想，可以概分爲下列幾個部份：

一、崇尚母教：一個人未來的成就，童年的教育是很重要的，而童年的教育，母教又佔最大的比重。大師自敘中，曾多次提到當他幼年時母親教導他的情形。嘉靖三十二年大師自述：「予八歲，讀書寄食於隔河之親家。母誡不許回，但經月歸一次。一日回，戀母不肯去，母怒，撲之，趕於河邊，不肯登舟，母怒，提頂髻拋於河中，不顧而回。於時祖母見之，急呼救起，送至家。母曰：『此不才兒不淹殺，留之何爲！』又打逐，略無留念。予是時，私謂母心狠，自是不思家。母常隔河流淚，祖母罵之，母曰：『固當絕其愛，乃能讀書耳！』」嘉靖三十年：「母奉觀音大士，每燒香禮拜，予必隨之。」大師這些眞實的自敘，決不是在數他母親的「罪狀」，而是告訴我們家庭教育對一個人未來成功的重要。不少人把青年的浮華不求上進，歸咎於學校教育的失敗，實則家庭應負大半責任。

二、處世淡泊：中山先生曾經告訴我們要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。這是何等的淡泊而積極！過於重視權位的人，決不容易淡泊，不能淡泊的人，爲社會服務，只不過是獵取利益的手段而已。出家是大丈夫的事業，必須有最淡泊的心境，才能無爲而無所不爲，去做普渡衆生的工作。嘉靖三十四年大師自述：「母曰：從小做起，有能，可至宰相。予曰：做了宰相却何如？母曰：罷。予曰：可惜一生辛苦，到頭罷了，做他何用？我只想做個不罷的。母曰：似你不才子，只可做挂搭僧耳。予曰：何爲挂搭僧，有甚好處？母曰：僧是佛弟子，行遍天

下，自由自在，隨處有供。予曰：做這個恰好。」由這番對話中，可以看出大師早已有了不貪求功名的淡泊精神，所以能摒絕世俗紛擾，一心一意地去作弘法利生的工作，也才能實至名歸，成爲輝炳史册的一代高僧。

三、胸懷寬大：胸懷的寬大與否，往往成爲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。小人常爲物役，君子則能役物，此胸懷之寬狹所致。崇慶六年：「……因自喜曰：吾力足輕萬鍾矣。銘其鉢曰，輕萬鍾之具，名其衲曰，輕天下之具。乃爲之銘曰：爾委我以形，我託爾以心，然一身固因之而足，萬物實以之而輕，方將曳長風之袖，披白雲之襟，其擧也若鴻鵠之翼，其逸也若潛龍之鱗，逍遙宇宙，去住山林，又奚衒夫朱紫之麗，唯取尙乎霜雪之所不能侵。」大師的胸懷多麼遠大！難怪他能遊行天下，作普渡衆生的工作。

四、愛國的思想：如果有人認爲宗教家都是消極無爲的，那是錯誤的，佛教在形式上雖近乎出世的，但是並沒有忘却這個現世，它的教義，是針對人間而發，它在某些地方比世俗更積極。大師雖爲一出家人，但却有濃厚的愛國思想。萬曆九年自記：「……其道場事宜俱備就，適皇上有旨祈皇嗣，遣官於武當，聖母遣官五臺，卽於本寺。予以爲沙門所作一切佛事，無非爲國祝釐，陰翊皇度。今祈皇嗣，乃爲國之本也，莫大於此者。願將所營道場事宜，一切盡歸併於求儲一事，不可爲區區一已之名也。」由此可見一斑。

五、己饑己溺的精神：大師愛他的國家，對百姓，則懷有己饑己溺的仁慈精神。「仁慈」是宗教家必具的精神，他的一生行誼，無不向着仁慈的目標做去。萬曆十二年：「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，訪求主事三人，乃大方、妙峯、與予也。……乃命舊主人，龍華寺住持端庵公親訪之。公知予在海上，乃策杖而至，具宣慈旨。……予竟謝不就，中使回，報以居山堅臥之志，聖意憐之，問無房舍，卽發三千金，仍遣前使送至，以修庵居。及至，予力止之曰：我茅屋數椽，有餘槀矣，何用多爲？乃不受。使者强之，不敢覆命。予曰：古人有矯詔濟饑之事，今山東歲凶，何不廣聖慈於饑民乎？乃令僧領來使，徧散各府之僧道孤老獄囚，各取所司印册繳報，聖情大悅，感歎不已。」萬曆二十五年：「予五十二歲，春正月，時會城死傷多，骸骨暴露，予因令人收拾埋掩，亦數千計，乃建普濟道場七晝夜，丁右武，身爲之佐。先是，粵人不知佛，自此翕然知歸……。」

慈山大師的思想細密而深邃，也很廣博，決不是三言兩語所可道盡，以上所擧，只是賅要而易感人者，使我們知所效法而已。

（東吳）